

萨达特回忆录

〔埃及〕安瓦尔·萨达特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萨达特回忆录

——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

〔埃及〕安瓦尔·萨达特著

辛 华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

根据埃及《十月》周刊阿拉伯原文译出

萨达特回忆录

——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

〔埃及〕安瓦尔·萨达特著

辛 华 译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91,000 字

1978 年 2 月第 1 版 197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11071·109 定价：0.75 元

（内部发行）

译者说明

本书是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所著《回忆录》的一部分，主要谈埃及同苏联的关系，也连带谈到埃及同美国的关系。这一部分包括《回忆录》的第一章至第十九章，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曾在埃及《十月》周刊上连续发表。

本书围绕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一九六七年的六月战争、清洗权力中心、驱逐苏联专家以及斋月战争等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详细地叙述了埃苏关系的发展，说明了埃苏关系之所以破裂以及埃及转向美国的演变过程。作者以大量生动的事实，揭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着“援助”、“支持”的旗号，行干涉、控制之实的丑恶嘴脸，反映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同时，也显示了埃及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色列的英勇斗争。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了解埃及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斗争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书中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共产主义、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斯大林等发表了攻击的言论，希望读者用批判的观点来阅读。

本书的副题似与内容不符，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对此，作者在第十六章中作了解释。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在翻译方面一定会有许多错误和不妥之处，衷心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

目 录

(一) 两幅人像·····	1
(二) 艾森豪威尔打电话说：行！中东地区的 面貌就变了·····	16
(三) 亚历山大的盛大欢迎是赫鲁晓夫完蛋的开始·····	29
(四) 苏联开始怀疑我们武装部队的能力！·····	45
(五) 早晨说：行；晚上说：我们不保卫埃及！·····	62
(六) 纳赛尔受不了这一切折磨！·····	79
(七) 苏联提出我们没要过和不想要的“武器清单”·····	99
(八) 苏联突然要求同埃及签订一项条约·····	121
(九) 为了埃及，我向暴风低下了头·····	140
(十) 祈求真主，无论如何也不去莫斯科！·····	156
(十一) 我有七项具体要求·····	171
(十二) 我发布了苏联人离开埃及的决定·····	186
(十三) 是“结账”吗？·····	197
(十四) 莫斯科的所有信件都毫无道理是“紧急的”！·····	211
(十五) 假如他们给一百辆坦克，历史已经改观了·····	227
(十六) 三十年前在狱中写下的梅特涅的几句话·····	241
(十七) 这是一条罪状吗？·····	254
(十八) “横渡”迷雾重重的大洋，前往美国·····	267
(十九) 对埃及搞阴谋开始了·····	281

(一)

两幅人像

一九二四年，我父亲随埃及军队从苏丹回国。那时，我仍在我们的“迈特阿布库姆”村。父亲带着我的一个兄弟和我去开罗，以便完成我们的学业。我住在库巴的一间房子里。开罗很大。世界也很大。人们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东西尽收眼底。映入脑际的景象数不胜数。发人深省的事物层出不穷。

当我们在开罗的住所的大门打开时，我脑子里便涌现出一个新世界。墙上有一张像。这张像令人感到突兀。它把人带入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真是咄咄怪事。它既不是埃及领袖穆斯塔法·卡迈勒的像，也不是国王的像，甚至也不是一幅那种我们家中习惯用来装饰墙壁或糊墙的风景画。

那是土耳其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像！

直到现在我仍感到意外。这张像深深地打动了，引起了我的遐想。我去问我父亲和别人。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这位伊斯兰领袖的事迹，也听到了一些关于阿塔图尔克的神话和传说。

神话是很久以前由人民编造出来的。各国人民习惯于抬高自己的英雄。这好象是对他们表示感激的一种方式。英雄

们提高了人民的地位，人民也抬高他们，加以渲染。

这个阿塔图尔克是梦想摆脱奥斯曼苏丹统治的穆斯林的希望所在。阿塔图尔克是这样一位热情、有为、勇敢并倔强的青年。他参加了远征利比亚和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队。他曾亲眼看到希腊军队占领伊兹密尔，看到同盟国军占领安那多罗半岛。阿塔图尔克一直不断地在他的支持者中间进行组织工作，终于拥有了一支军队。为了贯彻一种思想，必须要有力量。这是一个条件。

他使外国军队撤离了，并赶走了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结束了苏丹统治，宣布成立共和国。他倾向西方。妇女揭开了面纱。

透过这一切，伊斯兰世界注视着这颗正在上升的明星。

我在这样幼小年纪所读的东西没有给我提出答案。我能干什么呢？或者说，如果没有一支实现自己理想的力量，就是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即一定要有一支支撑、扶持与捍卫这种思想、并将其推向生气勃勃的阶段的力量。必须这样。我不晓得自己是怎样产生这种想法的。但愿我已把这种想法抛弃，而在自己的生活中继续学习，就象每个普通公民那样。

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使我长时间耿耿于怀。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我从军事学院毕业时，世界由于希特勒而惶惶不安。他是纳粹党的新领袖。全世界都在谈论战争和战事迫近的问题。那时，出现了慕尼黑危机。希特勒已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意大利、英国和法国都对此表示同意。希特勒又要求更多的领土。英国反对。最后，英国不得不派

张伯伦出马。英、法两国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这时，张伯伦感到他取得胜利了，感到他为整个世界实现了和平，当他回到英国时，他对英国人民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与体面。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张伯伦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如果当时英、法两国阻止希特勒，他最后就会放弃战争，而正是张伯伦的姑息唆使他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邱吉尔当时反对张伯伦，他说：“英国必须在战争和耻辱之间进行选择，而我们选择了耻辱，我们势必将有一战。”

不久，邱吉尔的预言应验了。

在笼罩全世界的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下，我们这些新的军官被分配去守卫开罗的公共设施。

可以肯定，象这些重大的事件激荡了我们青年人的思想，使我们脑海里的一个紧迫问题重新呈现出来，并更加鲜明和突出：我们能够干什么呢？

我再说阿塔图尔克。假若没有一支军队，他就一事无成。埃及的青年一定也要考虑这一点。因为，英国人正占领着我们的领土。政治家把政治作为商品，他们向我们灌输他们的腐朽思想和作风，他们是使我们在早年生活中跌倒的最坏的那类东西。那时，我们阅读历史，阅读有关埃及领袖穆斯塔法·卡迈勒的事迹。

我们在童年时听着扎赫拉民歌、关于“丁沙维”的故事以及阿德海姆·萨卡威谱写的歌曲进入梦乡。这些都是射向英国占领军的子弹。

当我心潮澎湃、满怀理想和激情时，我考虑干点什么

就不足为奇了。我曾同所有的政党进行过接触。这是在我从军事学院毕业之后。而当我在这个学院就学期间，除了“少年埃及”党外，我确实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政党。我参加了少年埃及党。我在阿特贝区的一座楼房里，在一个俯视菜市场的大阳台上接受军事训练。在阳台上，他们对我们进行制式教练。

那时，我担心警察搜查少年埃及党党部，发现我填的表和我的名字。我当时还在军事学院学习。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我从军事学院毕业后，越发感到焦虑不安。我开始在各个政党之间徘徊不定。我试图给我脑子中盘旋的问题找到解释或答案。我试图找到一种使我满意的思维方式，或者找到一个向我解惑释疑的人。

我采取的第一个积极的具体行动是同阿齐兹·米斯尔进行接触。他曾同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共过事，因此极负盛名。在阿拉伯世界由于反对土耳其人或土耳其的革命而一片沸腾时，他参与建立了许多阿拉伯社团组织。当时，人们称土耳其为“病夫”，这个病夫需要阿塔图尔克用很大力气来使他复兴和变得年轻，赶上西方文明，把在奥斯曼苏丹统治下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在那以后，我同穆斯林兄弟会进行了接触。这一切和其它一些事情都是在我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发生的。当时我只同哈桑·贝纳先生接触，同他进行了很多讨论。我们有分歧。他想把我们在军队中的组织置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卵翼下。那时，我们在军队中的目标是：为了埃及而进行组织和行动。

我对贝纳先生说：我想同你开诚相见，我们已经决定，我们的组织只服从于埃及的利益，而不是为某个组织、政党或个人服务的。

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事。

随后，我于一九四二年被捕入狱。

纳赛尔从苏丹回来时会见了贝纳先生，向他坦率地表明了同样的立场。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们始终坚持这一立场。可以肯定，这种立场或这种哲学是我们最引以自豪的。因为，我们的运动是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我认为，我已纠正了前一时期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消除了一切疑虑。

现在，一切都十分清楚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干什么？是为了谁、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我不断地同一些社团和政党进行联系。我想知道一切，或想知道别的一些人为了给埃及谋利益正在想些什么。后来，我被赶出军队，被捕、获释，坐牢、出狱。

阿里·马希尔建立了一个党派组织，党部设在尼罗宫大街。我是第一个敲门的人。我又同进门时一样迅速而热忱地走了出来。我没有如愿以偿。我转而寻求其它一些出路，或者寻求一种新的思想、一些新泉或清风的源头。

但是，我在这里强调一下，我没有同任何共产主义组织发生关系。

可能有过一次。那是一位同学告诉我，在穆卜泰迪扬大街有一个地方，这是一个讲演厅，人们可以进去听别人讲话。

我这位同学对我说：你是个青年，你有政治热情，在动

乱不安的情况下，你了解各种事情，找到一个妥善的归宿。去吧，听一听，想一想，然后作出决定。

我去了，到了里面。地方很小，墙上贴满了墙报，有人在看上面写的东西。我思索了一下，感到有些可疑，有些不正常。

没过几天，警察来了，包围了这个地方，冲进去抓了人，并把墙报撕毁。幸亏真主保佑，我去的那天，警察没有监视那里，否则，他们会把我抓走。不难理解，那是一个共产党的支部。

如若我问自己：那时我对共产主义的确切了解是什么，那么我在那样年纪的回答是，我知道的不多，可是，我的希望却很远大；在我梦寐以求的和我力所能及的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由此，我钦佩那位借助军队才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的阿塔图尔克。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作为一位领袖和一个最崇高的榜样深深吸引了我。那时，我正读着一本名叫《灰狼》的书，是阿姆斯特朗写的。这本书是一部文学杰作，浅显易懂，象我那样大和具有我那样有限的英语知识的人都能看懂和欣赏它。尽管由于我酷爱在铁窗后面所学过的几种外语，英语水平已有所提高，但我的英语至今还不够好。

这本书是落在我手中的一件珍宝，或者说是我一头扑在上面的一个宝藏，它抓住了我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埃及和英国情报局的命令，我曾被放逐到西部沙漠，在马特鲁港以南一个名叫杰拉威拉的地区。但是，这本书减轻了我在这个沙漠地区感到的那种令人痛苦的寂寞。记得，当

我读到这本书的一半，为所读到和看到的东西感到津津有味、为作者在我眼前展示的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感到兴高彩烈的时候，他们把我召回去了，因为我与阿齐兹·米斯尔有牵连。他的座机在葛尤卜坠毁了，和他一起遇难的有两位飞行员：侯赛因·佐勒夫卡尔·萨布里和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卜杜·拉乌夫。

从马特鲁港出发，他们把我放进了一辆法戈牌小汽车，车速不超过六公里。我在车里睡了一整夜。醒来时，发现汽车已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感谢真主，没有与别的汽车相撞。

那是一次艰难的旅行。我们通过沙漠公路到达吉萨，陪同我的警卫官用电话进行了联系。他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把我带到国防部。在那里，他们把我放在国防部部长秘书室里。我没有去换换衣服或洗把脸，便坐在一张凳子上，打开了《灰狼》这本书，全神贯注地继续读着，以补上我在那个痛苦的夜里所耽误的时间。我不知道门已打开，一个人站着向我这边瞧。于是出现了每个人在有人瞧着他、而他还不知道的情况下通常发生的事情：他迅速抬起头，看这个正在瞅自己的人。我也那样做了。我迅速起立，行了一个军礼。我把书放在自己身旁。这个我向他敬礼的人不仅这样瞟人，还说：嗨，你就是安瓦尔·萨达特！

他走了，我才知道他是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易卜拉欣·阿塔拉。他没有想到问问这本使我忘却周围世界的书，如果那样做，那么除了同阿齐兹·米斯尔有牵连外，他还会对我加上一项新的指控。

那时候，我的知识很一般，没有看过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我以及每个埃及人心中有一个深刻的概念：共产主义就是叛教和亵渎，他们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任何价值标准，对宗教不感兴趣。我同每个乡下人一样，认为亵渎宗教是无法无天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不信仰宗教，那他就放荡不羁。那就意味着：丧失一切人性，把一切伟大的东西以及公正、善行、自由和人道主义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因此，我出于一个虔诚的乡下人的禀性，从一开始就拒绝那一套。

当我访问设在穆卡泰迪扬的那个令人生疑的支部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它是一个共产党的支部。那位邀请我去的同学，想利用我寻求为埃及做些积极的工作时感到的忧虑和困惑，但我没有顺从他，我只是跟着他，去了，进去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说，我们家墙上的阿塔图尔克的像曾激荡了我的思想，那么另一张像则动摇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使我更加坚信我的宗教和我的道德价值标准。

战争已经开始了。我手拿地图，注视着战争的进程。我浮想联翩，因为我自始至终经历了这场战争。

战争开始时，希特勒同斯大林达成了协议。后来，邱吉尔插了进去，在这两位领袖中间打下一个楔子。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进犯苏联——这场战争的前奏、经过和结果是尽人皆知的——盟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打希特勒。邱吉尔宣称，他准备同魔鬼结盟。这个魔鬼就是斯大林。因为那时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打希特勒。

于是，西方同斯大林结成联盟，即他们同这样一个人结了盟：他们说他们反对宗教、没有道德，并说共产主义主张拆散家庭、破坏一切尚存的有价值的东西。在开罗幽暗的大街上，我经常看到美国罗斯福、俄国斯大林和英国邱吉尔这三巨头的许多像。比这些铺天盖地的像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颂扬斯大林、颂扬抵抗纳粹野兽的英雄的苏联人民的书籍。

最初，俄国人是野兽；当希特勒打他们时，就成了天使，赢得了极大尊敬。那么，出了什么事？这个鞑靼野兽斯大林怎么成了一位传奇式的英雄？

我试图弄明白。我提出了问题。我对此关注备至。许多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都同我一样深思过。我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能使自己信服的结论：只是因为他们正在与一个共同敌人进行战斗，即只是出于利害关系。

战争结束了。大家战胜了希特勒，也就是说俄国人、美国人和盟国胜利了。胜利的光辉照耀着世界各国首都，也照耀着开罗。随之，斯大林的像消失了！

那时，这个事实使我懂得：这个邱吉尔只是我的敌人！

诚然，邱吉尔作为一个为他的国家服务的英国公民，受到了我的赞赏。他写了一些漂亮而深刻的回忆录。但是，我将此留给英国人，由他们去引以自豪并尽情赞扬吧。而他始终是我的敌人。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不相信他。我应当这样做。如果他把一个人说成是天使，那我则说：是个魔鬼！

如果他说某人是魔鬼，我就说是一位自天而降的天使！

这种倔强和执拗是同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二十三岁的青年的脾性完全吻合的。他思想上没有灵活性，没有足够的知识，没有经验。我的世界仍然是有限的。我的黑白截然分明的生活画板上的颜色是一些单纯的颜色，我还不知道那些调配起来的颜色。还不知道！

我还相信另外一个已经在我脑子里扎下根来的想法：是邱吉尔给我们弄来了这些人。

我对这些人感到讨厌。在那以后，我没有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进行接触，直到我们的革命爆发，我成了新闻和宣传的负责人。

同阿卜杜·拉赫曼·萨尔卡威接触，是我第一次同他们中的一个人发生联系。那时，他在美国人在日本广岛扔下原子弹后，写了一首题为《致杜鲁门的一封信》的诗歌。这首诗歌极为洗练和优美。他到我这儿来要求准予发表。我读了这首诗，颇为欣赏，并且高兴地吟哦起来。我建议他改动两三个词，使之更臻完美。我宣布可以发表，因为它的艺术形式打动了。我没有认识到那是一首共产主义的诗歌。革命指挥委员会中的同事们将此事告诉了我，问我怎么会批准这样一首共产主义的作品。我的回答是：它是一首文艺作品，因此，我批准了！

在我们革命之后，我们面临着一种异常的处境。这种处境促使我们转向俄国人，接近他们，并同他们发生冲突。

我们同俄国人的关系一直犹如浓云，一旦成为雨水降下，天空便清澈如洗，可是土地却被淹没了！

在革命成功两个月之后，英国驻开罗大使馆和大英帝国

对于我们的革命和发动这场革命的人一无所知。发动这场革命的人拒绝同英国大使馆接触。而我们同美国人却有联系，我们要求美国人向英国人说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想同他们对话，因为七十年来一直有八万五千名士兵占领着我们的领土。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浩劫，欠下了血债。为此，我们起来革命，纠正这一历史。

英国人用禁运武器来对我们同他们接触进行惩罚。当时，英国是我们唯一的武器来源。我们还不甚了解美国。因为美国很晚才进入这个地区，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英法两大帝国日薄西山之后。以后，美国的政策是建立一个包围苏联的条约带^①，即在中东遏制苏联。不过对美国的行事方式另有一种叫法：新殖民主义，即一种不用舰队和军队的殖民主义，一种依靠做买卖、特别是出售武器的经济殖民主义。

当美国试图向我们提供一些武器时，英国提出了抗议。这是美国不卖给我们武器的直接原因。因为，英国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我们是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的！

这件事情的原委是：我们同美国人进行了接触，向他们说明了埃及军队的奇怪状况，以及由于得不到我们从英国订购的武器而进入的困境。这样，美国人于一九五三年要我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到美国去。但是，当这个代表团到达美国时，却没有一位美国官员出来会见，尽管是他们促成并邀请我们去那里的。

^① 指杜勒斯于五十年代初在中东拼凑的“北层防御地带”。——译者